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 編

甘肅省卷 上

中國簡牘集成

第三冊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簡牘集成

〔標註本〕

第三冊 甘肅省 卷上

新學堂
PDG

主 編：

初師賓

本卷主編：

吳初驤

本卷說明

甘肅省地處黃土高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結合部，是古代中原與西域的重要陸上通道，也是我國古代各民族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地區之一。戰國時期，秦國的疆域已西抵洮河流域。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秦國版圖抵達黃河東岸。漢武帝中期，為抗擊匈奴，聯結西域，隔絕羌胡，又開辟河西，設置郡縣，移民墾田，並修築塞防，駐兵屯守，烽火相望，徼巡不息。自此，東起天水，西迄敦煌，郡縣相連，道路通暢，人口增殖，經濟繁榮，文化興盛，是秦、漢王朝西部的生產基地、安全屏障和對外往來的交通樞紐。因此，各地遺留有大量歷史遺迹和遺物。由於西北氣候乾燥，作為人們日常使用的文書、簿籍、經典、字書、數術、方技等文字資料載體的簡牘，得以保存下來。早在南北朝和北宋時期，就有人在今甘肅省等地發現漢代的簡牘。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些歐美、沙俄和日本的地理、考古學者和軍人，紛紛前往中亞和我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甘肅省西部進行所謂的探險活動，掠奪我國的歷史文化遺產。其中，一九〇七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在甘肅省西北發現漢代邊塞烽燧遺址，隨後沿邊塞遺迹進行調查、挖掘，發現漢代簡牘七百零八枚。這是我國近代田野考古大批發現簡牘之始（此前在新疆樓蘭等遺址亦發現少量晉簡）。此後，一九一四年，斯坦因又沿疏勒河、黑河（內蒙古自治區境內稱額濟納河）流域，在今敦煌市、安西縣、玉門市、金塔縣等地的漢代邊塞城障、烽燧遺址中，發現一百八十九枚漢簡。一九二〇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盤城遺址西北的戈壁上，掘得漢、晉簡牘十七枚。一九四四年，前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夏

龔、閻文儒在今敦煌市以北的漢代邊塞遺址掘得漢簡四十九枚。以上共計四批，獲得漢、晉簡牘九百六十三枚。

一九四九年以後，隨着我國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在甘肅省境內，先后發掘或採集到大批秦、漢、晉簡牘，其數量遠遠超過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總和，並且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根據簡牘的出土情況，大致可分為兩大類。

一類為邊塞、郵驛遺址出土簡牘。主要從敦煌、玉門等地的漢代邊塞城障、烽燧遺址和敦煌懸泉郵驛遺址中發掘或採集而來，十三個地點共計獲得漢簡一千五百二十五枚。一九四九年以前採獲的漢、晉簡牘，亦屬於這一類。

邊塞、郵驛遺址簡牘，大多為邊郡屯戍吏卒日常使用後遺棄的廢物，其中的大部分已被作為燃料燒盡，少部分或作為垃圾拋於塢堡之外，或作為墊圈柴草，被畜糞漚爛；剩下的極少部分作為手紙，棄於糞坑。因此，這類簡牘多數殘斷、漫漶，保存完整的很少。而且文字由於出於多人之手，字體各異，潦草錯訛，通假、異體、俗字、口語文字、特定用語等衆多。書體除少數為工整隸書外，多數為日常手書草體，由於當時草書尚在形成過程中，很不規範。上述種種，為我們今天的整理、研究工作帶來許多困難。

邊塞、郵驛遺址簡牘，內容主要為詔書、律令、官府文書、簿籍、符傳、封檢以及與吏卒生活有關的私人書記、契券、曆譜、數術書、方技書、字書等等。詔書多為抄件，一類為朝廷教諭天下吏民的文告，一類為中央行政命令。律令多為與屯戍有關的律令條文摘錄，如捕律、祠律、太尉挈令、北邊挈令、赦令、擊匈奴降者賞令、烽火品約、伏虜品約等。官府文書內容龐雜：有奏書，奏報朝廷的文書底稿；有各級官府之間的事務往來檄、記；有司法文書，包括詔名捕文

書、爰書、狀辭、司法案例、判辭等訴訟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文書。簿籍是漢代官府進行日常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在官文書中數量最多，名目繁雜：一類為人員、糧物應廩名籍；一類為人員、糧物實廩簿；一類為日常屯戍活動集簿，如兵器出入簿、守御器出入簿、戍卒勞作簿、烽火記錄、省卒名簿等。符傳，符分出入關符和廩物符兩種。傳為出入關禁和行路的憑證，分在籍戶民出入關禁的證明和各級官吏因公出行的身份證明兩類。封檢，一類為官文書檢署，置於文書外封，錄受書單位、傳遞方式；一類為轉輸衣物、糧谷封檢，錄品名、數量，或受僦人郡縣、姓名、僦人縣里、姓名等；一類為封頸，為挂於牲畜頸項之標志，錄序數、產地、數量、毛色、牝牡、齒齡、主人姓名等。契券，多為吏、卒之間有關衣物、糧錢的買賣、借貸契約。曆譜，種類繁多，有日曆譜、干支譜、月朔、大小、四時節候譜、建除神殺譜等。數術書，有占天象氣候書、卜筮書、易傳、九九算術等。方技書，有醫方、水利書、相馬書、相刀書等。字書，有蒼頡篇、急就章等。

簡牘時代，上自西漢中期（武帝後期的天漢三年，公元前九十八年），下迄東晉十六國（約公元五世紀初），以西漢宣、元、成帝時期的簡牘最多。簡牘質料，絕大多數為木簡，以檉柳（又名紅柳，*Tamarix Ramosissima* Ldb）為主，其次為杆兒松（*Picea Neoveitchii* Mast），再次為胡楊（別名胡桐，*Populus Euphratica* Oliv），竹簡很少。簡牘形制，有簡、兩行、牘、觚、枋（削衣）、封泥枋、楊（簽）、符、籌等。簡，一般長約二十三點三厘米，即漢尺一尺，寬約零點八厘米，多編綴成冊，一般以麻繩上下交錯編連，尺簡多為兩道或三道，個別簡在編綴處留有契口，以固定編繩，一般先編後寫，可書寫一行文字，多作官府文書、簿籍使用。兩行，長與簡同，寬約二厘米，可書寫兩行文字，多用於官府文書。牘，即木板，長與簡同，寬度不等，可多

行書寫，多作簿籍用。觚，多數爲等腰三角形，長與簡同，文字書寫於簡腰兩側，多作官府正式文書即『檄』的書寫材料。除此，還有四棱形和不規則形，長度不等。四棱形的觚，四面或三面書寫，多爲蒼頡篇、急就章等字書。不規則形觚，用途多樣，大多作文書或簿籍使用。梯，爲錯寫後以書刀削下之廢片，大小厚薄不等，字迹殘缺不全，故俗稱削衣。封泥柙，爲文書檢封後受封泥之木匣，多作正方或長方形，中留封泥孔，多數爲兩側全通之方槽，個別中留方孔，兩側留數道承受繩索之細槽。楊（簽），爲文檔、器物之標籤，多上圓下方，長約七點六厘米，寬一點九厘米，上有穿系麻繩，頂繪或符號，兩面書寫。符，長漢尺六寸（約合十四厘米），有刻齒和傅別，分左右券，以刻齒或墨書筆劃相合以取信。籌，即籌碼，作計數用，有長方形，有四棱形。

邊塞、郵驛遺址簡牘，不僅全面反映了漢晉時期河西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交通、文化等面貌，而且在某些方面反映了當時全國的社會情況。簡牘的大量出土，爲我們研究漢晉時期的屯戍制度（包括烽火制度、徼巡制度、出入關制度、考績制度、更戍制度、軍屯制度等）、郵驛制度、文書制度和邊郡官制、兵制，以及中西交往、民族關係、經濟活動、社會生活等，提供了極爲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敦煌漢簡》一書，將甘肅敦煌邊塞、郵驛遺址出土簡牘集中印行。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敦煌懸泉郵驛遺址經過三年的考古發掘，又出土了漢、晉簡牘兩萬餘枚。目前這批簡牘正在整理中，有待發表。

一類爲墓葬簡牘。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主要從古代絲綢之路沿綫的秦、漢、晉代墓葬中陸續發掘清理出土，十座墓葬共計獲得秦、漢、晉簡牘一千一百二十五枚。

墓葬簡牘，多爲墓主人生前使用、死後隨葬的律令抄本、典籍、醫方、《日書》，以及葬儀中

常備的遺冊等。與邊塞、郵驛簡牘比較而言，大多內容較為系統、完整，保存較好。文字由一人或數人完成，很多均為工整隸書，字迹清晰易辨；少數手書草體，雖亦有通假、異體，但字體較有規律，易於掌握。

墓葬簡牘中，較為重要的有：

一、天水市放馬灘秦墓出土的《日書》。其中甲種《日書》七十三枚，乙種《日書》三百八十枚，《墓主記》七枚。現甲種《日書》已全文發表。《日書》是古代數術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數術是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一大門類，在《漢書·藝文志》中，與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方技等并列，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天水秦墓《日書》的出土，還為探索秦代數術的楚、秦兩個係統的聯係與區別，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二、武威市磨嘴子六號漢墓出土的《儀禮》簡共計九篇，四百六十九枚。武威《儀禮》簡的出土，是西晉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汲郡魏冢出土竹書以後，我國歷史上第二次大量經書的重現。《儀禮》簡的出土，使我們在現今所見的鄭玄註本之外，看到了一個未經打亂師法、家法、未經糅合今文、古文以前的西漢后氏禮本，這個本子不但揭示了西漢中期不同於大、小戴氏家法的慶氏之學，而且通過對簡文與今本的比較研究，使我們了解了《服傳》、《喪服》中經文、紀文、傳文三部分的演變過程。《儀禮》簡還為我們研究漢代的簡冊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在版本學、校勘學和古文字學上，也有重要研究價值。

三、武威市磨嘴子十八號漢墓出土的《王杖十簡》和同一墓群出土的《王杖詔書令》冊；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的律令簡；甘谷劉家山東漢墓出土的詔書抄本。這些簡牘，均為當時實際使用并久已佚失的漢律條文和詔書，對於研究漢代司法制度和尊老養老制度，對於了解漢代朝廷優

撫劉氏宗室的情況，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四、武威市旱灘坡東漢墓出土的醫簡。這批東漢早期的醫簡，不僅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以往所發現的漢代醫簡的總和，而且內容豐富，包括了醫學上的內、外、婦、五官、針灸等科，記載了各科的病名、症狀、方劑、制藥方法、服藥方法、針灸穴位、禁忌等；在藥物學方面，記載藥物達一百種，其中三十三種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學著作《神農本草經》中未記錄的。武威醫簡早於東漢張仲景著的《傷寒雜病論》，是目前已發現的我國第一部方劑學，它以辯證立方體現了我國傳統醫學的辯證施治法則。它的出土，是我國醫學史上的重大發現，為研究我國古代醫學關於生理、解剖、方劑、病名、治療、養生等問題，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科學資料。

上述墓葬出土簡牘的釋文、摹本、圖版，已分別發表於《武威漢簡》、《武威漢代醫簡》、《漢簡研究文集》、《秦漢簡牘論文集》、《散見簡牘合輯》，以及《文物》一九九三年第十期等著作、簡報中。

為了廣大研究、教學工作者閱讀、使用的便利，我們將二十世紀以來已經發表的甘肅地區除居延漢簡以外的出土簡牘，統一體例，匯編成集。對簡牘釋文，對照原簡照片、圖版，進行了校訂、標點。對通假字、異體字、俗字、特定用語、口語文字等，作了少量註釋。對武威《儀禮》簡，根據《武威漢簡》的原校記，作了改寫。標註、釋文之外，還附以有關出土地點圖和簡牘編號索引等資料。

由於水平所限，在編輯、校訂、標點、註釋的過程中，一定存在不少的訛誤，望海內外學者匡正。

目錄

甘肅省卷

本卷說明

一、

敦煌市漢代邊塞城障烽燧遺址出土簡牘〔敦煌漢簡〕

卷上 一

(一) 敦煌市馬圈灣烽燧遺址(D21) 發掘出土簡牘

卷上 五

(二) 敦煌市後坑墩(D20·T11) 採集簡牘

卷上 一五七

(三) 敦煌市馬圈灣烽燧遺址(D21) 採集簡牘

卷上 一六一

(四) 敦煌市小方盤城(D25·T14) 採集簡牘

卷上 一六五

(五) 敦煌市臭墩子墩(D65·T23o) 採集簡牘

卷上 一六九

(六) 敦煌市小方盤城南第一烽燧(D81) 採集簡牘

卷上 一七三

(七) 敦煌市蘆草井子墩(D83·T14c) 採集簡牘

卷上 一七七

(八) 敦煌市小方盤城南第二烽燧(D82) 採集簡牘

卷上 一八一

(九) 敦煌市鹽池灣墩(D22·T12a) 採集簡牘

卷上 一八五

(十) 敦煌市小月牙湖東墩(D57) 採集簡牘

卷上 一八九

(十一) 敦煌市疏勒河北三墩(D8·T1) 採集簡牘

卷上 一九五

(十二) 敦煌市酥油土北墩(D38) 採集簡牘

卷上 二〇三

(十三) 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所獲簡牘

卷上 二一五

(十四) 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簡牘

卷上 三〇七

甘肅省卷

.....	卷下
(十五) 一九四四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獲簡牘.....	卷下 一
(十六) 一九八八年敦煌市人頭疙瘩採集簡牘.....	卷下 九
(十七) 敦煌研究院收藏舊出敦煌簡牘.....	卷下 一三
敦煌市漢代懸泉置遺址採集簡牘〔敦煌漢簡〕.....	卷下 一七
玉門市花海柴墩子南墩(Y29·T44b)採集簡牘.....	卷下 二九
高臺縣常封晉墓出土木牘.....	卷下 四三
武威市磨嘴子六號漢墓出土簡牘《儀禮》.....	卷下 四七
武威市磨嘴子十八號漢墓出土《王杖十簡》.....	卷下 一九七
武威市磨嘴子漢墓出土《王杖詔書令》冊.....	卷下 二〇一
武威市五壩山三號漢墓出土木牘.....	卷下 二〇九
武威市旱灘坡漢墓出土醫簡.....	卷下 二二三
武威市旱灘坡東漢墓出土木簡.....	卷下 二三五
武威市旱灘坡十九號晉墓出土木牘.....	卷下 二三九
甘谷縣劉家山漢墓出土簡牘.....	卷下 二四七
天水市放馬灘秦墓出土竹簡《日書》甲種.....	卷下 二五七
附一：敦煌市漢代邊塞城障烽燧遺址出土簡牘釋文編號索引表.....	卷下 一
附二：甘肅省出土簡牘地點位置圖.....	卷下 插頁
附三：新出敦煌漢簡地點位置圖.....	卷下 插頁

甘肅省 卷

一・敦煌市漢代邊塞城障烽燧遺址出土簡牘

〔敦煌漢簡〕

二十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進行第二次中亞考察，於一九〇七年，在今甘肅省敦煌市西北榆樹泉盆地東側，發現漢代塞垣遺迹和烽燧遺址。隨後，在敦煌市境內沿漢塞遺迹，逐個烽燧進行調查、編號、挖掘，獲得漢簡七百零八枚。調查報告發表於《塞林提亞、中亞和中國西域考古記》(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s, Oxford, 1921)。簡牘委托法國漢學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進行研究。一九一三年，沙畹將原簡照片和釋文，發表於《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考察所得漢文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 Vol. Oxford, 1913)。原簡藏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一九一四年，我國學者羅振玉、王國維，對沙畹發表的部分原簡照片作了釋文和考證，合著《流沙墜簡》。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斯坦因進行第三次中亞考察。於一九一四年四月，自敦煌市西北的後坑，沿漢塞遺迹向東，經今安西縣、玉門市，至金塔縣東北的天倉(毛目)，繼續對漢塞遺迹和城障烽燧遺址進行調查、編號和挖掘，又獲得漢簡一百八十九枚。調查報告發表於《亞洲腹地、中亞、甘肅和伊朗東部考古記》(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4 Vols. Oxford, 1928)。一九一七年，沙畹去世，此次所獲漢簡，改由沙畹的學生馬伯樂(Henri Maspero)進行研究，遲至一九五三年，才發表於《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Vol. London. 1953)。原簡藏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此前，中國學者張鳳旅法

留學時，從馬伯樂處得到第三次中亞考察出土簡牘的照片和出土地點編號。一九三一年，他將上述材料連同沙畹書後所附第二次考察出土簡牘的圖版在國內刊布，並對文字作了考釋，出版《漢晉西陲木簡匯編》，其中收錄了不少後來馬伯樂書中沒有的原簡照片。

一九四四年，前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赴甘肅省河西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夏鼐和閻文儒自敦煌南湖向北至小方盤城，再自當谷隧向東至三個墩子，沿漢塞遺迹對部分烽燧遺址進行了調查，採獲漢簡四十八枚。夏鼐考釋了漢簡，連同原簡照片發表於《新獲之敦煌漢簡》（載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後收入夏鼐《考古學論文集》）。原簡現藏臺灣臺北圖書館。閻文儒撰寫了《河西考古雜記》（載一九五三年《文物參考資料》第十二期，後經作者增補，又發表於一九八六年《社會科學戰綫》第四期），介紹了遺址考察和漢簡出土情況。一九八四年，林梅村、李均明根據上述三批漢簡釋文、漢簡出土編號和出土情況等資料，進行核對，出版了《疏勒河出土漢簡》一書，並制成漢簡出土地點編號和漢簡著錄編號一覽表，糾正了過去的錯誤，對過去的釋文也進行了重新校訂，為敦煌漢簡的研究，提供了許多便利。

一九七九年六至七月，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現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與敦煌市文化館合作，對敦煌市境內的漢塞和烽燧遺迹進行調查。在小方盤城遺址以西十一公里處的馬圈灣，發現一座斯坦因遺漏的烽燧遺址，給予新編號D21，並於當年九月進行了試掘，出土漢簡一千二百一十七枚。一九九一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將馬圈灣烽燧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和漢簡釋文，連同一九七七年以後，在敦煌、玉門市等地漢塞沿綫的後坑墩（D20、T11）、馬圈灣燧

(D21)、小方盤城(D25、T14)、臭墩子墩(D65、T230)、小方盤城南第一燧(D81)、蘆草井子墩(D83、T14c)、小方盤城南第二燧(D82)、鹽池灣墩(D22、T12a)、小月牙湖東墩(D57)、疏勒河北三墩(D8、T1)、酥油土北墩(D38)、人頭疙瘩烽燧、玉門市花海柴墩子東南墩(Y29、T44b)、以及敦煌懸泉漢代郵驛遺址採集的漢簡，敦煌研究院收藏的一九二〇年周炳南在小方盤城附近採集的漢、晉簡，連同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漢簡、一九四四年夏鼎、閻文儒所獲漢簡和部分原簡照片，匯編成《敦煌漢簡》一書出版。這是敦煌漢簡出土以來的首次匯集，對中國簡牘學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本冊敦煌邊塞簡牘部分，以《敦煌漢簡》為藍本，依據該書所附的原簡照片，對簡牘釋文作了新的校訂和標點，並對少量簡牘作了註釋；將不屬於邊塞簡牘的敦煌懸泉遺址採集簡牘析出，新列《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採集漢簡》，而《敦煌漢簡》原來所編的簡牘順序號，全部保留。書後另附《河西邊塞簡牘出土地點編號和漢簡著錄編號對照表》和《新出敦煌漢簡地點圖》。

一九七九年九月

(一) 敦煌市馬圈灣烽燧遺址(D21) 發掘出土簡牘

馬圈灣烽燧遺址，位於敦煌市區西北九十五公里，東距小方盤城十一公里，西距後坑（又名西湖）二點七公里，北距疏勒河八公里。遺址位於漢代塞垣遺迹內側三米的戈壁上，發掘前，為一圓形砂丘，直徑約十五米，頂高約三點五米。一九〇七年斯坦因調查時遺漏。一九七九年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現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對河西漢塞進行調查時發現，編號DS1。同年九月進行發掘，全面揭露了烽燧、堡屋、畜圈、井架、灰區，發掘面積一千九百平方米，出土簡牘一千二百二十一枚，帛書一件，絲麻織物、糧食、紙、木、漆、竹、草、革、鐵器、狩獵工具、貨幣、玩具等三百四十三件。簡牘質料絕大多數為木簡，其中又以檉柳（又名紅柳）為主，約占全部出土簡牘的百分之五十四點一；竹簡很少，僅十六枚；還有一枚以蘆葦制作的簡，殘長五厘米，寬一點二厘米，厚零點三厘米。簡牘形制，除一行簡外，還有兩行、牘、觚、枳（削衣）、封泥枳、枳（簽）、符、籌等。簡，完整的一般長約二十三點三厘米，即漢尺一尺，寬約零點八厘米。多編綴成冊，一般以麻繩上下交錯編連，尺簡多為兩道或三道。個別簡在編綴處留有契口，一般先編後寫。兩行，長與簡同，寬約二厘米。觚的形制較複雜，多數為等腰三角形，長與簡同，文字書寫於等腰兩側，其用途多作官府正式文書如《檄》的書寫材料。除此，還有四棱形和不規則形，長度不等。四棱形的觚，多為蒼頡篇、急就章等字書。牘即木板，長與簡同，寬度不等。枳，為錯寫後以書刀削下之廢片，大小厚薄不等，字迹殘缺不全，故稱削衣。封泥枳，為文書檢封後承受封泥之木匣。枳（簽），為文檔、器物之標籤，多上圓下方，長約七點六厘米，寬約一點九厘米，上有穿、系麻繩，頂繪半圓花紋。符，即符信，其形制必有刻齒和傅別，一般長約漢尺六寸，即十四厘米左右，或一側刻齒，或中剖，以刻齒或墨書筆劃相合以取信。籌，即籌碼，作計數用。簡牘內容，有詔書、奏書、檄、記、簿籍、律令、爰書、契券、封檢、枳（簽）、曆書、術數書、字書、信牘、符、籌等。馬圈灣烽燧遺址的發掘，是歷史上首次在敦煌地區進行的漢代烽燧遺址科學發掘，所獲漢簡不僅數量上超過前四次的總和，而且在層位、斷代上有了更確切的依據。原簡現藏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